殷企平共同体诗学建构研究

A Study of Yin Qiping's Construction of Poetics of Community

管南异（**Guan Nanyi**）

内容摘要：本文梳理殷企平三十余年共同体诗学的发展脉络。其理论体系依托滕尼斯“有机共同体”、威廉斯“情感结构”与“深度共同体”思想，借鉴阿诺德以来的英国文化批评传统建构而成。殷企平的研究直面双重现代困境：现代机械文明割裂了传统共同体纽带，同时南希、布朗肖等学者的“独体论”，从根本上消解了共同体的建构可能性。他将独体论的哲学争议转化为实践命题，提出共同体并非固化的形而上学概念，而是在文学阅读、审美共享与日常交往中不断生成的动态文化实践，其维系之核心是心灵深度沟通与情感共振，而非制度、利益等外在因素。这一理论从心智培育、得体会话、音乐共振、理想人格多个维度落地，近年又融入幸福伦理与共享愉悦理念，深挖共同体的内生情感动力。以文学重建现代社会精神联结始终是殷企平共同体诗学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殷企平；共同体诗学；深度共同体；文化实践；情感

作者简介：管南异，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

Title: A Study of Yin Qiping's Construction of Poetics of Community

Abstract: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al thread of Yin Qiping's poetics of community spanning more than thirty years. 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Ferdinand Tönnies' conception of the "organic community" and Raymond Williams' theories of "structure of feeling" and "deep community," drawing on the British cultural criticism tradition dating back to Matthew Arnold. Yin's research addresses a twofold modern predicament: modern mechanistic-utilitarian civilization has severed traditional communal bonds, while the "singularity thesis" advanced by Nancy, Blanchot, and others has dissolved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Rather than engaging with this philosophical dispute on ontological grounds, Yin reframes it as a practical matter. He proposes that community is not a fixed metaphysical entity but a dynamic cultural practice generated through literary reading, aesthetic sharing, and everyday interaction; what sustains it is deep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instead of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institutions or interests. The theory is elaborated through such dimensions as mental cultivation, civil conversation, musical resonance, and ideal personality. More recently, it has incorporated the ethics of happiness and shared pleasure, probing the internal emotional drives of community. Throughout,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bonds in modern society through literature stands as the governing concern of his community poetics.

Keywords: Yin Qiping; poetics of community; deep community; cultural practice; sensibility

Author: Guan Nanyi, Ph.D.,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guannanyi2007@126.com).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分析英国小说中的人际关系异化，到 2025 年讨论沙夫茨伯里（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与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共情”之争，殷企平对共同体问题的思考跨度三十余年，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在共同体遭受工具理性与后现代理论双重攻击的当下，他试图在维多利亚小说的文本细读中寻找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启迪。本文旨在追踪殷企平共同体诗学的生长轨迹，并发现其力量所在。

一、共同体的理论资源与挑战

西方共同体研究通常溯源至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887）。这也是殷企平共同体研究的主要思想源头之一。他在多篇论文中援引“有机共同体”与“机械社会”的对立，作为理解英国文学中共同体书写的理论起点。但是，作为文学评论家，殷企平更为倚重的共同体理论资源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和“深度共同体”（deep community）概念。在《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1961）一书中，威廉斯创造了“情感结构”这个术语来描摹转型时期民众鲜活却难以言说的集体共同经验，并强调唯有基于这种共同经验的默契，群体之间方能达成有效交流，此即“深度共同体”。[1]“情感结构”是威廉斯的主要概念，而“深度共同体”只在此处提及。殷企平继承了“情感结构”，并且使之成为自己主要的文本解读策略——早在 2003 年的论文中，他就以此分析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小说《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 1875），揭示艾尔弗雷德爵爷对暴发户麦尔莫特“欲踢又止”背后的社会心态变迁；他更将“深度共同体”发扬光大，不但探讨了“心智培育”等抵达深度共同体的路径，还提出深度共同体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以个体为本，“不深究个人，就没有共同体的深

1 参见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1, 64-65.

度”；二是包容异质，若容不下陌生人便无深度可言。他援引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诗句“每遇一人都似曾相识”，直言“这才是深度共同体境界”。[1] 由此可见，殷企平的共同体思想既追求群体和谐，亦重视个体内在心灵，同时包容多元异质存在。

共同体理论之外，对殷企平影响更为深远的一条学术脉络，源自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开创的英国文化批评传统。阿诺德以批判功利主义的机械文明为起点，试图构建和谐有机的文化共同体。殷企平在“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2010）中提出“文化是焦虑”的命题（74）。这个论断看似惊人，却精准揭示了文化与机械文明之间的内在对立。他多次引用阿诺德的一句名言来说明这个问题：“文化了解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言论和思想，就会调动起鲜活的思想之流，以冲击工业文明中强大的机械性”（208）。他进一步发现，阿诺德提出的文化观念不断发展，经罗斯金（John Ruskin）之手，“作为个人精神状态的文化”转变为“作为总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这一新的文化观念背后已经浮现出“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与和谐性的向往”，而文化观念的发展造就了化解焦虑的两条路径：即从事批评与提供愿景。[2] 这正是他本人建构共同体诗学的主要路径。

共同体问题在中国学界虽然早有涉及[3]，但真正的研究热潮始于 2013 年殷企平发表的“‘朋友’意象与共同体形塑”以及后续以“共同体”为题的系列论文；而“共同体”逐渐成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关键词，是在 2016 年他发表论文“西方文论关键词”之后。[4]2019 年以后，外国文学领域三年内连续获得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凸显了国家层面对这一议题的重视。[5] 殷企平的共同体诗学得以领风气之先，其实是他自身学术关切的数十年发展结果，而坚持立足文学文本来观察共同体的塑造，是他的另一个特点。

殷企平的工作，开始于对现代机械文明的批评。他对共同体课题的全部热情，似乎都来自现代性造成的人情淡漠与共同体瓦解给他带来的焦虑。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就为机械文明诊断出互相纠缠的三大病症，即道德想象的萎缩、有机纽带的解体和对话机制的失效。他在后续的研究中一直保持着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过，他要解决的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当代“独体

1　参见 殷企平：“华兹华斯笔下的深度共同体”，《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5）：80-82。

2　参见 殷企平：“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外国文学》3（2010）：80。

3　参见 张子清：“不同华裔美国作家构筑想象中的不同共同体”，《当代外国文学》3（2001）：86。

4　参见 郭英剑、刘向辉：“‘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思想——美国族裔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2024）：76。

5　包括李维屏主持的“英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与审美研究”（2019）、生安锋主持的“美国族裔文学中的文化共同体思想研究”（2021）和徐彬主持的“流散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2021）。

论”的冲击。让 - 吕克 • 南希（Jean-Luc Nancy）、莫里斯 • 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J • 希利斯 • 米勒（J. Hillis Miller）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理论家从多重维度指出：共同体一旦开始运作与言说，往往就滑向单一均质的整体性格局；共同体建构的推进力度越强，就越容易走向自我消解；唯有不可辨识、无法规约的独体（singularity），方能抵御这种消解性危机。[1] 这类观点从根源上对共同体建构的可行性提出了根本性质疑。

就在希利斯 • 米勒《小说中的共同体》（*Communities in Fiction*, 2015）问世次年，殷企平刊发“西方文论关键词：共同体”（2016）一文，专门回应独体论相关思潮，此举亦象征其共同体诗学建构进入更深层次的理论探索阶段。如果说殷企平前期研究多立足于外部批评视角，主张文学承载的文化力量能够弥合机械文明带来的创伤，那么面对独体论带来的理论冲击，他转而深挖共同体内在情感驱动力，围绕幸福、愉悦等核心维度展开论证，以此解答“共同体何以可能”这一关键命题。殷企平并不完全否认独体论的价值，因为后者提醒世人警惕日常习俗被工具理性操纵。不过，他敏锐地察觉到独体论的逻辑存在三处软肋：把动态的文化实践偷换为形而上学的固化概念；把有限的个体隐私夸大为阻止交流的根本障碍；最重要的是，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2] 对殷企平的共同体诗学建构而言，独体论倒逼出的最大成果，是他借机澄清了共同体的本质，即共同体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文化实践。这实际上与他多年以来的研究思路完全一致。

二、共同体的本质重构与多维展开

殷企平对独体论的回应，主要是将问题从本体论转移到实践论。他在“共同体”一文中指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还是优秀的文学家，他们在倡导共同体时，并不仅仅把它看作一个形而上的概念，而是更多地把它看作一种在持续行动中展开的文化实践。[3] 他以乔治 • 爱略特（George Eliot）为例，指出她的写作“不是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培育有关手段的意识”，即审美培育能“全面改变人的感受力，进而最终改变社会”（“共同体” 76）。独体论认为共同体一旦运作就会形成区分你我的边界；殷企平则通过文学分享重新界定了运作，因为文学并不规定有边界的实体，而是通过创作、阅读、评论、教育、审美共享等实践活动，持续地训练共同感受的能力。它不强制同化，也不提供蓝图，只是在一次次心灵共振中不断产生联结。这样，共同体从一个需要明确界定的名词变成了动词，表现的是人类朝向和谐生存状态的持续努力与不

1 参见 让 - 吕克 • 南希：《无用的共通体》，郭建玲、张建华、夏可君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3-14、45、186 页；莫里斯 • 布朗肖：《不可言明的共通体》，夏可君、尉光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5-6、66 页；J. Hillis Miller, *Communities in Fictio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17, 88-91.

2 参见 殷企平：“西方文论关键词：共同体”，《外国文学》2（2016）：76-78。

3 参见 殷企平：“西方文论关键词：共同体”，《外国文学》2（2016）：76。

断更新。他在讨论阿诺德等文化批评家时反复强调，他们各自的理想社会图景不尽相同，并无一套可以复制的具体社会改造方案，值得吸收的是他们对整体与和谐的共同向往。在阐释伯克（Edmund Burke）提出的道德想象这一概念时，他进一步说明文学实践具备参与社会秩序建构的功能：这种理想秩序并非依托法律，而是借由道德想象与教养浸润人心，文学正是实现这一过程最有效的载体。[1] 他甚至说："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批评工作，其实是由优秀的文学家们来完成的"（"文化批判的来龙去脉" 46），类似的观点散见于他的多篇论著。对他而言，文学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一种积极的伦理力量。在这一点上，殷企平其实呼应了聂珍钊教授的相关伦理批评思想，后者曾经批评一些人打着"文化批评"旗号，却"颠倒了理论与文学之间的依存关系，割裂了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内存联系"，只注重"对某个文化命题的求证，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聂珍钊 44）。

殷企平构想的共同体形塑，以心智培育为基础，通过会话交往、音乐共振和理想人格塑造等多维度展开。这些维度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其中心智培育为共同体形塑准备了主体条件。培育心智主要是指培育道德想象力，即想象、理解他人处境，对他人产生同情的能力。殷企平认为同情是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纽带，能促进主体之间的情感流通。他借用英国学者罗伊尔（Nicholas Royle）对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 1871-1872）的评论，称同情心是对他人生命境遇生出的"深刻洞见和强烈感受"，仿佛"倾听青草的生长和松鼠的心跳"（"从自我到非我" 77）。但共情能力并非轻易可得，往往要历经自尊心被撕痛的难堪境遇，在自省与悔悟中唤醒良知，方能对他人的困苦感同身受。他以爱略特的另一部小说《丹尼尔·德隆达》（*Daniel Deronda*, 1876）为例：女主角关德琳从极端自恋，到因屈辱而痛苦，最终学会体察世间众生，这一转变正是心智培育的完整历程。他借用小说叙事人的话说，"当自我就是非我时，我们就变得有德性了"（Eliot, *Daniel Deronda* 349）。

健全的心智教化落实于社会交往的重要路径，便是真诚而得体的对话交流。殷企平将"会话"视为抵御现代性割裂、重建人际联结的文化实践形式。他指出，自 18 世纪以来，日常语言常沦为空洞的闲言碎语，削弱情感与思想交流，阻碍共同体的形成；而会话能否成为共同体的语言载体，取决于是否得体。他发现英国文学中有两种会话模式：1）艾迪生、斯梯尔式的礼貌模式，以温和交流培养公民美德；2）约翰逊博士式的交锋模式，以思想碰撞逼近真理；而真正得体的会话实践往往在二者间取得平衡：例如，在奥斯汀（Jane Austen）名著《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1813）中，伊丽莎白对柯林斯的回应兼具礼貌与真诚，既肯定对方描述的婚姻幸福，又没有放弃自己

1　参见 殷企平："作为秩序的文化：伯克对英国文学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1（2017）：42。

的信念，体现了分寸感与和谐。不过，殷企平更看重交锋模式的潜力，因为它直面差异个体间的联结问题。譬如，在《丹尼尔·德隆达》中，音乐家克莱斯默尔批评关德琳趣味低下，但同时赞赏她的音色与调子，交锋与接受并存，使会话实现了有效沟通。[1]

与会话相比，音乐被殷企平赋予共同体诗学中的重要地位，似乎更令人惊讶，但其实不难理解。会话能在理性层面促进沟通，音乐却能带来更直接、更深层的心灵共振。例如，他发现小说《好伙伴》（*The Good Companions*, 1929）中的音乐像“酵母”般消融隔阂，令病人、囚犯在乐声中齐聚，恍若踏入“更光明的世界”；日常算计与阶层差异随旋律消散，代之以基于共同人性的“同心协力”。[2] 前文提到的克莱斯默尔对关德琳的尖锐批评之所以能够生效，不仅因为批评本身的得体与深刻，更因为在批评之前关德琳已被他的音乐演奏深深打动：“高低音洪流般的交汇犹如天摇地动，把渺小凡人的行为冲刷得不足轻重”（“从自我到非我” 79）。克莱斯默尔的钢琴声软化关德琳的坚硬自我，使她的灵魂能与世界交流。殷企平所说的“音乐”不仅指声音艺术，也包括文字的节奏。他借福斯特（E.M.Forster）的小说理论指出，文字的节奏仿佛交响乐，掩卷之后会有一种“未见笔端”的东西在读者内心反复回响，这是“更大的存在”。[3] 华兹华斯、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诗歌善用“抑扬四音步”，因这种格律源自古老歌谣，自带“为共同体代言”的基因，能唤醒读者的文化记忆，“把个人和内心的东西改造成共有的、公众的东西，也就是变成可以辨认的、大家认可的文化话语的一部分”（“丁尼生的诗歌与共同体形塑”50）。音乐 / 节奏能引向福斯特所说“更大的存在”，个体由此挣脱机械碎片化的焦虑，长出感知他人与整体的健全心智。

最终，心智教化、真诚对话和情感共鸣集中体现在维多利亚小说塑造的各类“理想人格”形象之中。殷企平对理想人格的解读，核心在于对维多利亚时代“绅士”观念展开批判与重构。他以《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 1865）里的波德斯纳普等人物为切入点，剖析传统绅士概念自带的排他特征：这类人物动辄以“英国性”和“体面”为标尺排斥异质群体，沦为瓦解共同体的异化力量；[4] 在此基础上，殷企平试图重塑绅士精神的内核。依托伯克的“教养”理论，他提出真正的“绅士”绝非表面的礼仪举止，而是“心中充满情感〔……〕热爱同胞，尊重同胞，并对自我保持警觉”（“作为秩序的文化” 43）。“对自我保持警觉”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傲慢

1 参见 殷企平：“英国文学中的会话与共同体形塑”，《英美文学论丛》24（2016）：43；47-51。

2 参见 殷企平：“英国文学中的音乐与共同体形塑”，《外国文学研究》5（2016）：61-62。

3 参见 殷企平：“节奏即境界：从福斯特的小说观说起”，《文学跨学科研究》1（2021）：134-135。

4 参见 殷企平：“‘朋友’意象与共同体形塑——《我们共同的朋友》的文化蕴涵”，《外国文学研究》4（2013）：46-48。

与偏见》中达西的转变便是一个例证。又如，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航海叙事将绅士的权威向内转化，“指挥意味着自我指挥”（“文化即秩序”109），即以自律克制自我，为他者留出空间。在殷企平看来，《荒凉山庄》（*Bleak House*, 1853）中的艾伦是新型绅士的典范。他出身平凡、家境清贫，却深入贫民窟救死扶伤，拒绝压榨底层民众，依托共情之心与责任担当重塑共同体纽带，因而被殷企平称作“狄更斯心目中的真绅士”（“‘多重英格兰’和共同体”122）。这一新型绅士形象的塑造，既冲破阶级藩篱，又充盈着共同体价值追求。倘若“绅士”范式难以摆脱男权精英的局限、尚存固有缺憾，那么《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娅恰好补足了这一理论缺口。殷企平提出，多萝西娅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事功，而在于其道德主体性的完整生成。经历婚姻理想破灭后，她摒弃空泛的圣徒幻想，将共情之心融入于琐碎日常，躬身践行“勿以善小而不为”的道德准则。[1]

三、共同体的情感根基

如果说共同体诗学所建构的文化实践体系及其阐释维度仍带有鲜明的理性特质，那么殷企平近年深耕的情感文化研究，则着眼于挖掘共同体赖以存续的底层驱动力。文化实践可能发生虚假的情感联结，导致各种伪共同体，因此可能异化为机械现代性的新变种，为独体论者所笑——因为他们并不否认存在各种文化交往，但认为这些交往只是暂时的、表面的，无法改变个体是独体这一终极事实。于是，当殷企平描述共同体的文化实践本质时，必须面对独体论者的反问：这种实践会不会是一厢情愿的设计和操演？它有可能真正激发人们的共同体诉求吗？有鉴于此，殷企平将共同体的内在根基落脚于两大情感核心：维系共同体运转的幸福伦理和共享愉悦。幸福伦理主张人唯有置身社会关系、主动承担责任方能获得幸福，个体由此需要在自由与责任之间求取平衡；而共享愉悦则根植于情感本能，因为分享欢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冲动。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但殷企平的论述重心逐渐偏向后者——相较于后天习得的责任伦理，共享愉悦更接近本源，是促使个体主动走向彼此、建立联结的原生力量。

在 2016 年发表回应独体论的“共同体”一文后，殷企平很快就开始讨论幸福伦理问题，先后在三篇论文中考察了责任与自省主题、秩序与自由的平衡关系以及启蒙现代性判断力危机的发生与拯救。这些论文意在说明共同体不光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个体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殷企平在研究《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 1814）时发现，启蒙运动将幸福从天堂拯救到人间，但不幸的是，幸福从此完全演变为个人的事情。但奥斯汀笔下的范尼却不是这样。她最终得到的幸福，是责任感的结果，因为她即便在痛苦中也在考虑他人的利益，要防止自己的爱“跟自私搭边”；她的责任感是她“获

1　参见殷企平：“作为秩序的文化：伯克对英国文学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1（2017）：48。

得幸福的基本保证”。[1] 小说中托马斯爵士在破产后的转变、汤姆在经历病痛后的悔悟，以及种种其他的生命升华都说明幸福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在经历共同生活的苦乐中产生的。不尽责任，就不可能获得幸福。

殷企平进一步引入了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情感文化概念。他将其解释为“深切的感受力”与“无私的想象力”相融共生的内在心性，也就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情愫”，认为这才能产生真正的幸福感。[2] 通过剖析乔治•爱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对利德盖特、多萝西娅二人助人之举的书写，殷企平得出如下论断：二者虽皆为值得称颂的尽责行为，发自本心、主动践行的担当能够带来心灵充盈的满足；但纯粹出于义务、为责任而尽责的善行，却不足以令人幸福。究其根源，前者在行为过程中依托感受力与想象力搭建起人与人之间真切的精神联结，幸福感也由此自然生发。[3] 接着，他将批判锋芒对准启蒙现代性的幸福观，指出工具理性诱发了普遍的判断力危机，并发现简•奥斯汀借助反讽这一文学叙事策略，拆解了爱玛以自我中心为根基的尘世幸福的幻象，由此印证“一个人必须谦卑才能找到幸福”。[4]

这一“幸福”系列论文提出的核心论断是：脱离共同体支撑的幸福终究虚妄，体察他人是体悟幸福的先决条件。尽管这一系列论述已切入情感研究范畴，分析却仍未跳脱理性思辨的框架。有鉴于此，殷企平近年将研究重心转向“愉悦”议题，以期深挖超越理性边界的深层情感内核。他在“英国文学中的共享愉悦与共同体形塑”（2025）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共享愉悦是共同体的一块重要拼图；没有共享愉悦，共同体是难以想象的”（42）。这一观点试图切入深度共同体的真正奥秘，即人类具有想要与他人分享快乐的近乎本能的冲动。他将这一冲动的人性根基追溯到沙夫茨伯里与霍布斯的争论。在反驳霍布斯“利益统治世界”的观点时，沙夫茨伯里指出，人性中天然存在着一种道德感——“情感、性情、欲念、热情、团体利益，以及其他无数的动能，都与自我利益相悖”（43）。殷企平认为，沙夫茨伯里提出的这一道德感，暗含着与自我利益相悖的、超越功利的愉悦。他又引用博伊森（Rowan Boyson）对沙夫茨伯里的总结，认为“愉悦带有社交这一内在性质”（43）。在“西方文论关键词：愉悦”（2024）中，他引用朱光潜的话指出，审美愉悦天然具有传达的冲动，“自得其乐还不甘心，它还要旁人也能见到这种意境，感到情趣”，因为要表现的是不吐不快、不得不言的秘密：“你传达你的情感思想，是要在许多‘同此心’的人们中取得‘同此理’的印证。这印证有如回响震荡，产生了读者的喜悦，也增加了作者的喜悦”（99-100）。

事实上，殷企平发现英国文学中共享愉悦的例子俯拾皆是：亚当•比德

1 参见 殷企平：“从《曼斯菲尔德庄园》看奥斯汀的幸福伦理观”，《文学跨学科研究》4（2017）：71-73。

2 参见 殷企平：“英国文学中的幸福伦理与共同体形塑”，《文学跨学科研究》2（2019）：292。

3 参见 殷企平：“英国文学中的幸福伦理与共同体形塑”，《文学跨学科研究》2（2019）：292。

4 参见 殷企平：“《爱玛》中的反讽与幸福哲学”，《外国文学研究》6（2025）：32-36。

劳动时的歌声、《艰难时世》（*Hard Times*, 1854）中马戏团的打击乐声、华兹华斯《序曲》（*The Prelude*, 1850）中诗人感动于农人的愉快劳作并与邻居们共享“乡间的清幽”，乃至《米德尔马契》中多萝西娅“清香般”的微小善行对周围人和读者的感动，以及阿克罗伊德笔下打动了每一代英国人、仿佛“银链般”将他们串联成一个共同体的鸟鸣。[1] 殷企平由此把愉悦提高到“共同体的精神纽带”的高度：“没有愉悦，何谈亲情、乡情和友谊？何谈共同体？”（“西方文论关键词：愉悦” 101）

从共同体的内生动力维度看，对共享愉悦的阐释是殷企平理论体系中一处关键推进。在此之前，他笔下的共同体属于规范层面理应达成的应然共同体。幸福伦理虽已揭示情感回馈对共同体的激励作用，但共享愉悦进一步完成价值转向，让共同体的维系根基落在人对美好体验的内在向往之上，塑造出主体心之所向的共同体。当共享愉悦沉淀为共同体的核心情感底色，个体参与共同体实践便不再是外在的责任约束，而是内生的精神渴求。殷企平描述了“独乐乐”化为“众乐乐”时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喜悦，并认为这种喜悦会带来“人格升华”和“蜕变”，“其中的共同体含义不言自喻”（“西方文论关键词：愉悦” 100）。于是前文所说作为文化实践的共同体也获得了长效且自洽的情感支撑。

追寻共通情感，是殷企平学术研究一以贯之的深层旨趣。其一，他对英国文学的长期考察，始终致力于弥合功利主义侵蚀之下断裂的人际情感纽带；其二，他对威廉斯“情感结构”理论的取舍与阐发，更清晰彰显了这一研究取向。威廉斯笔下的“情感结构”是一个逐渐变化的复杂概念，存在清晰的理论转向：“从强调直接经验、强调一代人共有的精神面貌和伦理价值，逐步转向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揭露与批判，以至把革命希望寄托于新兴文化因素的崛起”（赵国新 83）。由此衍生出两条截然不同的理论发展路径。威廉斯的主要继承者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放大了“情感结构”的政治批判属性，认为文学批评的使命不在于培育读者的感受力，而在于揭露文本中隐蔽的权力结构与阶级话语（*Criticism and Ideology* 33-34）。不同于此，殷企平接续并拓展的，实则是威廉斯早期思想中偏重情感联结与共同体建构的思想脉络。他借华兹华斯文本阐释“深度共同体”的研究路径，认为华兹华斯与威廉斯“不谋而合”（“华兹华斯笔下的深度共同体” 80），这也印证了他对威廉斯理论内部浪漫主义思想脉络的深度体察。

另一组理论对照，同样能够凸显殷企平思想底色里鲜明的情感本位取向。在阐释心智培育维度的道德想象时，他主张个体应冲破封闭的自我壁垒，乃至“去除所学”（“再论外国文学教学的艺术之路” 44），主动建立与他人的深层联结。这套理论思路，与当代另一种极具影响力的道德想象论形成清晰分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 The*

1 参见 殷企平：“英国文学中的共享愉悦与共同体形塑”，《外文研究》2（2025）：45-47。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1995）中同样肯定文学对读者共情能力的塑造作用，但她并未指向对个体边界的消解、走向“非我”境界，而是倡导以自我为基点的“由己及人”式共情。她格外看重个体独立价值，并引入亚当•斯密（Adam Smith）“公正旁观者”概念，提出共情心应当依托理性约束，始终维持适度的客观疏离。[1] 不难发现，针对“文学何以塑造伦理主体”这一命题，努斯鲍姆给出的是自由主义框架下拓展个体道德能力的方案，而殷企平则开辟了一条以人与人之间原生情感联结为根基的阐释路径。

从早期对功利主义“进步”话语的审慎反思，到中期深耕英国文化批评传统，再到近年持续阐发幸福伦理与共享愉悦理论，殷企平对共同体诗学的建构呈现出层层递进、不断拓深的完整脉络。这套理论体系并未预设完备的规划蓝图，却始终不离其核心要义，即依托心缘纽带缔结而成的深度共同体。通过对独体论的批判性反思，该理论进一步明晰共同体动态、开放的文化实践属性。它将心智培育作为立论根基，在得体对话、音乐共情、理想人格彼此勾连的多维度场域中铺陈开来；依托幸福伦理与共享愉悦双轨情感机制提供内生动力，使共同体能够在文学阅读实践中不断生成、自我更新。殷企平在“共同体”一文中指出：“就文学领域而论，讨论共同体的理由首先来自普遍存在的‘共同体冲动’”（78）。在其后一系列研究里，他持续阐发、巩固这一核心命题，认为但凡卓越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内心都蕴藏着“共同体冲动”。这份精神诉求指向对理想社会的展望，渴望构筑一种挣脱亲缘、地域的边界、自然有机生成，兼具生命力与群体凝聚力的共同体形态。不难看出，这套关于“共同体冲动”的阐释，也是殷企平对自身理论建构的精准注解。

Works Cited

马修 •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年。

[Arnold, Matthew. *Culture and Anarch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 translated by Han Minzho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莫里斯 • 布朗肖：《不可言明的共通体》，夏可君、尉光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年。

[Blanchot, Maurice. *La Communaute inavouable*, translated by Xia Kejun and Yu Guangji. Chongqing: Chongqing UP, 2016.]

Eagleton, Terry. *Criticism and Ideology.* London: Verso Editions, 1978.

Eliot, George. *Daniel Derond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郭英剑、刘向辉：“‘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思想——美国族裔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2024）：75-80。

[Guo Yingjian and Liu Xianghui. “The Cultural Community Thought of ‘Harmony in Diversity’: A New

1 参见 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09-110 页。

Perspective on American Ethnic Literary Study."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6 (2024): 75-80.]

Miller, J. Hillis. *Communities in Fiction*. New York: Fordham UP, 2015.

让 - 吕克 • 南希：《无用的共通体》，郭建玲、张建华、夏可君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

[Nancy, Jean-Luc. *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 translated by Guo Jianling, Zhang Jianhua and Xia Kejun. Zhengzhou: Henan UP, 201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Others*.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P, 2012.]

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Nussbaum, Martha C.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translated by Ding Xiaodong. Beijing: Peking UP, 2010.]

Williams, Raymond.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1.

殷企平："英国文学中的共享愉悦与共同体形塑"，《外文研究》2（2025）：42-49。

[Yin Qiping. "Communal Pleasure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Foreign Studies* 2 (2025): 42-49.]

——："西方文论关键词：共同体"，《外国文学》2（2016）：70-79。

[—. "Community: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16): 70-79.]

——："英国文学中的会话与共同体形塑"，《英美文学论丛》1（2016）：40-55。

[—. "Conversation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1 (2016): 40-55.]

——："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外国文学》3（2010）：73-82。

[—. "Culture: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3 (2010): 73-82.]

——："作为秩序的文化：伯克对英国文学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1（2017）：41-49。

[—. "Culture as Order: Edmund Burke's Influence on English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7): 41-49.]

——："华兹华斯笔下的深度共同体"，《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5）：78-84。

[—. "The Deep Community under the Pen of Wordsworth."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2015): 78-84.]

——："英国文学中的幸福伦理与共同体形塑"，《文学跨学科研究》2（2019）：284-294。

[—. "Eudaimonistic Ethics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2 (2019): 284-294.]

——："从自我到非我——《丹尼尔 • 德隆达》中的心智培育之路"，《外国文学研究》2（2015）：73-82。

[—. "From the Self to the Not-self: The Roa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in *Daniel Deronda*."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15): 73-82.]

——："再论外国文学教学的艺术之路"，《当代外语研究》1（2026）：40-48。

[—. “Further Explorations on the Artistic Dimens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Teaching.”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1 (2026): 40-48.]

——：“‘朋友’意象与共同体形塑——《我们共同的朋友》的文化蕴涵”，《外国文学研究》4（2013）：41-49。

[—. “The Image of ‘Friends’ and Community Building: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Our Mutual Friend*.”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3): 41-49.]

——：“文化批评的来龙去脉”，《英语研究——文字与文化研究》 第 12 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0 年，第 33-49 页。

[—. “The Ins and Outs of Cultural Criticism.” *English Studies: Text and Cultural Studies* 12.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20. 33-49.]

——：“《爱玛》中的反讽与幸福哲学”，《外国文学研究》6（2025）：26-37。

[—. “Irony and the Philosophy of Happiness in *Emma*.”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25): 26-37.]

——：“从《曼斯菲尔德庄园》看奥斯汀的幸福伦理观”，《文学跨学科研究》 4（2017）：70-78。

[—. “Jane Austen’s Views on the Ethics of Eudemonia as Reflected in *Mansfield Park*.”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17): 70-78.]

——：“‘多重英格兰’和共同体：《荒凉山庄》的启示”，《外国文学评论》3（2014）：110-125。

[— “ ‘Multiple Englands’ and Community: The Revelation of *Bleak Hous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3 (2014): 110-125.]

——：“英国文学中的音乐与共同体形塑”，《外国文学研究》5（2016）：58-68。

[—. “Music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6): 58-68.]

——：“西方文论关键词：愉悦”，《外国文学》2（2024）：89-101。

[—. “Pleasure: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24): 89-101.]

——：“节奏即境界：从福斯特的小说观说起”，《文学跨学科研究》1（2021）：133-144。

[—. “Rhythm Is an Ideal State: Proceeding from Forster’s Views on the Novel.”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1 (2021):133-144.]

——：“论《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中的情感结构”，《外语教育》1（2003）：86-89。

[—. “The Structures of Feeling in *The Way We Live Now.*”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1 (2003): 86-89.]

——：“丁尼生的诗歌与共同体形塑”，《外国文学》5（2015）：47-54。

[—. “Tennyson’s Poems and Community Building.” *Foreign Literature* 5 (2015): 47-54.]

张子清：“不同华裔美国作家构筑想象中的不同共同体”，《当代外国文学》3（2001）：86-95。

[Zhang Ziqing. “Different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Construct Their Own Different Imagined Communities.”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3 (2001): 86-95.]

赵国新：“情感结构”，《外国文学》5（2002）：79-84。

[Zhao Guoxin. “Structure of Feelings.” *Foreign Literature* 5 (2002): 79-84.]